

非洲艺术与文化

E.NI. 库尔考朴尼等著
黄耘译

Dangme 文化中的自我装饰与宗教的力量

Robert Brain 在《身体装饰》中写到：“装饰后的身体可以变成一片圣地，宗教的画布或许具有道德之意。对我们的而言，作为物质的身体是恐惧和犯罪之源。肉体之弱点胜于它的力量。要理解纹身的观念或是敬神时对皮肤的乱割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在加纳南部的 Dangme 人中，遇到一个为其精神世界而饰有各种各样的纹身的人，我们见到的仅仅是他的外观。在 Dangme 人中，着装以及出于宗教目的而戴的装饰物都离不开衣物、珠子和皮肤上的纹样。这些因素是被看作一个整体，它们的象征意义从根本上说，来自在使用中如何进行整体的配合。在这里，我调查了身体具有的吸引力在 Dangme 人的社会团体中的构成模式和它的意义；它们与 Dangme 人宇宙观的关联问题。

Dangme 人居住在西非加纳南部的 Accra 平原。沿海人口中，渔业是占优势的职业。但是居住在 Accra 平原北部陡峭的 Akwapim 山脉南麓的内陆人，就从事农耕。同 Akwapim 人一样，几支 Akan 和 Guan 人也居住在丘陵地带。Ewe 人在 Dangme 人东边的 Votta 河对岸，他们的西边是 Ga 人，居住在加纳的首都 Accra。

跟他们的邻居 Ga 人一样，Dangme 人也说一种东部 Kwa 人所说的 Niger-Congo 语。Dangme 人和 Ga 人同时也共享其它文化特征，包括社会和政治组织。大多数 Dangme 人居住在小的、分散的村落。其它人口居住在南部加纳的七个大城镇，每一个城镇分别成为隶属 Dangme 七子群的核心，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传统区”。即 Kpone、Prampram、Ningo、Ada、Dodwaa、Osudoku 和 Krobo 这七个。每一个主要的城镇有几个从属的卫星村落，它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关系，人们常常发现主要的城镇是传统政治权威的所在地；是重要的宗教圣地；重要的宗教仪式也在那里举行。

艺术与宗教生活

西非 Dangme 人的艺术很少被研究的原因，或许是由于他们村里只出产小雕塑。在过去，艺术家们雕刻木偶和纺织产品，但现在也不做了。今天，装饰丰富的 Dangme 雕刻可在 Ewe 人的神庙里看到。雕塑传统缺乏明确的定义也许是 William Bascom 评述的依据，即 Dangme 人和他们的邻居 Ga、Ewe 的艺术是不发达的。然而，有证据表明，Bascom 的评论超出了什么是非洲艺术的界定。

我在 1986—1989 年对 Dangme 人居地的调查期间，遇到了其它的艺术形式。在他们中间存有活跃的身体艺术传统。包括精细的身体画、珠子工艺、妇女发式、服装。这些装身艺术的格式是周期性的、短暂的，常常需要与一年一次的宗教节日相符合。另外，因其保存的时间不长，Dangme 人的身体艺术也许会使早期的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缺乏身体艺术资料的另一个原因，在他们为了举行重要宗教仪式而装饰身体时，也许早期的研究者还未到达过该地区。最后，Dangme 人的宗教艺术特点通常很少带有美学特征：少用色彩、只讲究做工精巧、注重本身的实用价值。正因为此，这种宗教用途的服装与出于美观的服装有着强烈的对比，例如加纳 Asante 政权的 Akan 族祭司的服饰。由于它是如此的平淡，以至于容易被忽视。

对于非常守旧的 Dangme 的来说，荣誉的力量是长期保持传统的法规。老的服饰样式、用珠子做成的手镯、集 Kusumi(神)一身的身体彩绘，都传达出对种族的骄傲。当然这是很自然的，Dangme 的女祭司出于特别需要保护的目的来装饰 Kusumi 神。在许多老城镇，正是女祭司担负着展示永存艺术形式的任务。

按照一种观念，在许多非洲社会中，老式服装的幸存需“首要地、单独的

存在于宗教背景”下。对 Dangme 来说这是事实，这也是为什么祖先的服装得以保留下来的原因。它仅用于最重要的周期性宗教仪式活动，它便与整个生命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宗教性的自我装饰是艺术具有生命力的原则性意义所在。

重要的、定期性举行的许多庆祝活动中，一年一次举行的集体祭祀神灵活动便是其中之一。因此每年此时，主要城市中的商业活动都要停止，以保证祭祀活动的进行。这种节日常常吸引那些同一祖先的游子回到镇上来，这是为了对他的 Dangme 身份的再次肯定。

这些年一度典礼的名字，象 Ningo 镇的 Jange - do(一种为 Lagoon 神跳的舞)、Prampram 镇举行的 Kpledzo(为 Kple 神跳的舞)，使人们想到这种宗教表演是人们精神的表现符号。遍及非洲的具有震撼力的音乐是传统仪式的重要成份。Dangme 的年度节日也是宗教活动开始和结束的标志，因在狂喜的节日中伴有由鼓、锣、竹棍产生的强烈音乐而别具特色。这种年度节日也为珠链、头饰、服装和身体彩绘提供了展示背景，而这些东西是精神荣耀的体现。到了节日末尾，一些表现形式就不再出现，只有等到下一年才能再见到它了。另外，一部分耐用的东西，如衣物、珠宝收回储藏室以待明年节日时再用。着装艺术可使人与精神世界相联系。

不知为何，学者常常忽视宗教服装对音乐和舞蹈的作用。对 Dangme 和 Ga 的人类学研究表明，缺乏对于视觉艺术与宗教活动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解。当强调宗教表演时，许多人又会忽视身体的艺术。Margaret Field 曾经提及在她的研究过程中，当有身体装饰出现时，她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 Ga 人的宗教行为和实际过程。只有 Hugo Huber 提供了他在 Krobo 期间的对人体艺术的描述。但是，即便他的研究工作如此细致，他也很少考虑到其它 Dangme 子群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缺乏对 Dangme 人体自我装饰的清楚明了的探查。

为节日穿戴的身体装饰品，在 Dangme 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全部都需要。女祭司在年度节日期间穿戴全套的宗教性服装饰件。这些服装要素也是其它传统节日的特征，包括女孩的成年礼及酋长的就职典礼。或许有多种解释身体艺术外表用途的方法，对 Dangme 宗教服饰的深入理解，诸如将其所传达的意义、价值和内涵作一个系统来研究，也许能引导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文化。

宗教与社会

将宗教职责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这也许就是 Dangme 文化的本质。宗教生活围绕父系氏族构成了原始社会组织的基础。一个叫做 Wetso 的氏族由许多叫做 Kasi 的子氏族组成。而每一个子族包含了许多有个性的家庭，他们的家族起源于一个传说中的男性祖先。Kasi 成员常敬奉他们自己特殊的神灵，这些神灵或是本土的或是国外的，得依赖于氏族组织来源的历史。无论怎样，每年的祭祠需集中敬奉主要的神灵。

Dangme 人信奉至高无上的神人 Mawu，同时也认为有的次要的神——不象 Mawu——可在自然景观中显现，诸如河流、礁湖、海和山。Dangme 人强调他们的信仰，是因为考虑到不可见的、善变的人际关系，因此时常需要通过他们的神来缓和关系。

Dangme 人把神分类为主要神和次要神。主神很少，它们都是最古老的神，有两种类型的主神——Kple 和 Klama。Klama 是本土神，Kple 来源于 Accra

平原的一个叫 Guan 的原始人群。他们不是被 Dangme 人驱逐了就是被同化了，Guan 人的宗教音乐与舞蹈也因此溶入了 Dangme 文化，而成为一体。

除 Kple 和 Klama 之外，Dangme 人也敬奉其它许多次要神灵——Wodzi(简称 WO)，WO 是血缘的、氏族的，抑或是不知何时起居住在村里的非 Dangme 移民的神灵。这些次要的神来源于 Abodo，可能是借鉴于邻里的 Akan 文化。供奉代表 Ewe 起源的泥塑是为了求得精神保护，宗教兼任了反映迁移到 Accra 平原的复杂历史。

事实上，Kple 和 Klama 神牵涉到早期的社会及城镇历史上的早期社会组织。在许多次要的城镇上，一个特殊的 Kple 或 Klama 神也许被当作一个保护神来敬奉。例如 Ningo 镇的礁湖神，Prampram 的女神——海神 Lalue。因此，当祭祀主神的时候，这种典型的年度祭祀反映出人们间共同的历史来源。

每一个 Kple 和 Klama 神在它的故乡有它自己的祭祀中心。在那里它有精细的神龛，可以得到有组织的男女祭司的供奉。从祭祀中心来的男女祭司，不管他们定居在何处，都必须努力为他或她的保护神建立附属神龛。照此方法，对许多主要神的崇拜抄近路越过了它们的边界线。

对神进行主要和次要的区分，仅仅是更复杂的分类的一个小方面。在 Dangme 人的神学中，精神世界是对人间社会的复制，由于有了不同的宗族、家庭、夫妇、孩子的参与，因此神灵可为男也可为女。宗教性自我在视觉效果上表现了性别的差异，也展示出神灵的等级和社会地位。Rosato 调查了在 Mayan 人的节日中宗教首领所代表的隐含喻意。Dangme 把同样的隐喻压缩进服装的外观中去了，它象征着男女祭司的社会地位。

众所周知，Dangme 男女祭司的宗教性盛装，增强了他们重要身份的区别。它与特殊的祭祀活动之间的关系，是给节日服装和自我装饰规定了特殊的代码，例如 Hugo Huber 曾说“Wono(男祭司首领)和处于次要地位的女祭司，通过服装外观清楚地标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支配宗教性服装的是神而非人。因此使得这些服装不能取消、不用和更改。Dangme 人也说，对他们而言，并非所有的宗教服装都是漂亮好看的，但是他们必须穿它。

对女祭司来说，为祭神穿着这种服装是表达她的信念和对她的神灵的赞美。身体装饰给她独特和神圣的身份，这是一个人为神圣职业奉献他或她的身体的一种方法。Prampram 地区敬奉雷神 Tsawee 的女祭司 Leekai addio 主张：“为宗教活动装饰自己是对神的敬仰。”

装身画

Dangme 的人体艺术包括了许多用白粉画的纹样，这些属于卓越的女性艺术。最高等级的男祭司很少在自己的皮肤上作画。但在重要的场合，我们常可以看到女祭司用白粉溶液、植物混合汁、磨过的木炭粉来装饰自己的身体。为公众的宗教性表演而装饰自己的身体是一种强烈的体验方式。绘制这些图案要花几个小时，一些时候某些装饰方法趋于流行的原因是由于受到了特殊的神的启示，它指导女祭司怎样来装饰自己；但另一些时候，女祭司按照她的神灵规定的喜好标准来装饰。

白粉装饰和在身体上画几何图形这个行为，可能是大多数女祭司经历过的根本精神定位的过程。为宗教目的画在身上的最简单的图案，是由单色粉末调合的液体画在躯干的上部和脸上。白色用得最多；其它的如兰色粉末，它或许用泥土制成的。1988 年，在 Old Ningo 镇举行的高等级宗教活动上，一个次要神灵的女祭司在她脸上画满颜色，一半脸用彩色泥土；另一半用木炭。据我的调查对象说这种图案象征着来自 Ewe 的神灵。在同样的宗教仪式上穿着椰纤维做的裙子的、Akan 神的男性信徒，也是用泥土装饰身体的上部。我被告知穿着这种式样的服装时，每一个 Akan 神的信徒都会如痴如狂，表现出非正常的行为状态——“人格的游离状态。”照 Field 的说法，这种行为显示了其具有神性标志。例如，象动物一样地走是对特殊神灵的祭祀。他们的行为是由支配他的灵魂所控制。他们常常被各自的神灵呼唤，并作出响应。这样，一个装饰过的信徒就可以做到肉体与精神的统一。艺术与舞蹈是这种沟通的工具。

大多数生动的身体装饰图形是由横向平行线构成的波浪纹和山形纹组成。女祭司把这些直线形基本纹样绘于躯干的上端或是腿的下部。在 Prampram 人中，传统力量似乎是最强烈的，这些图案对他们而言是神灵的等级证明，如“侏儒之灵魂”——abodo。那些信仰 abodo 的人有上述的相同喜好。许多女祭司告诉我，在神灵显现后，她的助手就把图案画在她身上，通过占卜得知神希望她怎样穿着。

Dangme 人的男女祭司认为，那些繁琐的母题纹样不及简单的、两条线的母题纹样灵验。后面那种纹样在祭祀主神 Kple 和 Klama 时，在年长的女祭司身体上出现，画上简洁的白粉母题前，他们在皮肤上涂一层叫做 merren 和 meme 的涂料，是用于尸体防腐的深绿色植物油。因为 meme 是停尸间仪式中的涂料，它被用来暗示精神的死亡。一些女祭司强调，她们使用 meme 是与用于尸体的用途有本质的不同。如果精神的死亡是合符常规的，就可用优越的白色粉末(叫做 ayido)在身体上画图案，以作此表示。如同白粉末象征生命一样。宗教节日年复一年，装饰的进程本身被认为可以使女祭司的精神与

神结合来恢复生气。如此，肉体的死亡将在精神世界里找到新的生命。

对男女祭司而言，平行线的母题标志着作为神的“孩子”的个体。Dangme 人在十九世纪从他们的邻居 Akan 人那里借来政权形式之前，祭司在 Dangme 人的社会中拥有政治权力。Dangme 人的首领因获得受到公认的宗教象征符号而长期具有政治权威。用白粉画的双线，可能是与 Dangme 人的政治职责相关联的重要信仰符号。在典型的新生领就职仪式上，一个拥立酋长的人三次在磨制过的白粉混合液体中浸他的二个手指。他在候选人的躯体上画平行线纹样：前额中间、脸颊上、每边肩部向下到手背以及脚上。在 Dangme 人的宇宙观里传达着很多有关人体部位的象征意义。例如在身体的特殊区域应用某种母题的纹样，意味着可获得某种宗教的力量。

1989 年 10 月我访问了 Kabiawe 族中拥立酋长的人，证实了这个印象。Hargo Taffa 解释了纹样母题的意义：“当你用这种方法为新酋长画标记时，全部的人都愿意将他看作 Konomlo(又害怕又尊重的人)。这就是为何一旦酋长接受了这个标记，他就代替了神的位置，所有的人，不管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是他的臣民。”Hargo Taffa 承认称作 ayilo 的标记仅仅是临时的，通常在酋长第一次沐浴后将消失。他接受的是作为不可见的象征权力的符号，是某种隐藏的标记，就因为他被如此画过，这个重要的风俗便授予酋长超常的权力。

白粉画的母题的其它用途，扩大了它对 Dangme 人宗教生活的暗示作用。1989 年在 Prampram 镇举行的 pledzo 节期间，它不仅用于人体上，同时也在举行宗教活动的指定地方画这种图案，也画在通往祭祀神灵的小树林沿途上。另外，全部祭祀 Digble 神的纪念物——凳子、扫帚、权杖——都被简洁地标识过。两个 Prampram 人的女祭司冲洗了属于 Digble 神和土地女神 Lalue 的凳子，然后再描绘它们。首先涂以叫做 meme 的药物防腐汁，再涂以微红的紫木做成的颜料 tun。在使用 meme 时，艺术的过程造成了观念的转变。

在宗教圈内，Dangme 人一遍遍地使用“Kun Ke ayilo”这个短语，它暗示了与精神相会的原理，这个短语表示了不可分离的红色，或许是称作“tun”颜料来象征土地，“ayilo”可能是白色。红色和白色具象化为坏运气和好运气、危险与安全。在某种背景下使用可能象征着与生俱来的危险，这个危险与移居风俗有关联。对 Dangme 人来说，正反情感并存或情绪不稳定正好是他们神性特征的证明。

平行线的母题纹样的广泛应用——考虑到 Dangme 祭司们的保存作用——定义了经历过长时间宗教观念的核心部份。其多样的背景——人身上、人工制品上、地上——提供了另外一些例子，即它们通过装饰人工制品来表达人体艺术母题。这种情况已经在非洲撒哈拉的其它地方得到证实。

珠子在宗教仪式着装上使用珠子，跟我们观察的白粉纹样应用一样，阐明了相同的对比区别：简单和最少色彩的珠子样式是最具力量的。这些重要的珠子使用次数有限，反映了少许美学观点，成为 Dangme 文化展示宗教力量的基础。

作为财富的代表，珠子是必要角色的标志。但是珠子一般又象征着精神的纯洁，戴着它们可获得上帝的赐福。即使男女祭司也可能戴着各种款式的珠子作为宗教仪式的修饰点缀。对他们来说，并非所有的珠子都重要。被称作 nyoli 和 tovi 的两种珠子——在使用时有限定范围，子安贝(从前非洲和亚洲某些地方使用的钱币)的外形——成为典型象征，或者说是祭司职位的“服饰签名”。除了这个，每一个样式的珠子被使用的数目以及它们的连接方式，都反映了信徒的入会情况和等级。例如，为 Kole 神服务的男、女祭司戴着全部由 nyoli 珠子构成的手镯，白色珠子由特殊的鱼骨头或象牙做成。Klama 神的加盟者们混合使用白的 nyoli 珠子和黑的 tovi 珠子，tovi 珠子是由不知名的果实种子组成的。比较看来，居住在 Volta 河东面的 Ewe 人是次等级神的皈依者，他们只戴子安贝外形的手镯和脚镯。

祭司等级不同，手镯上 nyoli 和 tovi 珠子的数量就要随之发生变化。新信徒每一边带一串纤维绳穿的珠子，已经入会但正在等待最后职位的那些人可通过 4 颗 nyoli 珠子和 4 颗 tovi 珠子组成的手镯而得以辨认。被完全任命的男女祭司所戴珠子的数目可以不确定，只要适合他或她的手腕即可。祭司头领带由 4 个 nyoli 珠子和 3 个 tovi 珠子组成的 7 颗珠串，因为数字 7 充满了神秘的力量。一旦用手镯进行了修饰，男女祭司不带它就不可以出现在公众面前了。使用这些神圣珠子的基本规则由祭司将之延伸进了政治领导阶层。当一个新首领去户外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戴的手镯是 7 颗白 nyoli 珠子和黑 tovi 珠子，类似祭司首领所戴的手镯。手镯总是戴在有力量的右手臂，当你伸出这边的手臂与其它人握手时，那人必定会注意到手镯，将立即知道你是有权势的人。因此，nyoli 和 tovi 珠子手镯的功能是当作精神和政治身份的最重要标记。

In Dangme 社会，利用珠子手镯作为确认领导阶层的符号，与 Igala、Edo、Igbo 和尼日利亚文化的其它南部地方相似。这一相似处使得交叉文化研究这一主题有了正当理由，它可能会增加我们对几内亚海岸地区王权历史的了解。

发式

一般而言，我们对发式的研究，扩展了关于 Dangme 人的身体艺术、宇宙

观和社会组织间相联系这一观点的探索。许多发式具有宗教礼仪的特点，为低等级神服务的女祭司剪去她们的头发或者用白棉布把它扎上；高等级的那些人有二种选择：一种是编成几股长辫后末端绑扎成一圆锥体，也可选择将头发挽成五个髻的方式；第二种发式叫做 akuku、akoko、akukuli，Dangme 人和 Ga 人两个地方都有。Akuku 是在正中一个髻的四周也盘上发髻，中间这个髻代表“聚集的头。”在 Prampram 和 Old Ningo 镇，这种发式是服务于本地神，且是知识渊博的女祭司的特权表示，所以说 akuku 发式代表资深的女祭司。

通常，整个的节日庆典中，按习俗必须梳 akuku 发式的女祭司，为此，为了这个独特的宗教仪式，她得蓄一年的长发。发式的简洁展示加上皮肤上画的白粉纹样，暂时地增强了精神状态而能获得赞美。

akuku 发式使人想到各种隐喻。例如，akuku 发式被比喻为如同衣服垫到头顶上一样，能承重物。按照 Asafoatse Addicole 的说法，酋长和宗教巫医发髻需排列成炉灶形，虽然它与传统 Dangme 炉灶并不相似。Addicole 解释说，炉灶支撑着煮锅，如同神支撑着 Prampram 城，这就是 akuku 发式的一个代表作用。在仪式中，还要用鹦鹉羽毛装扮插在头顶上或插在中间的髻上。鹦鹉羽毛使人联想到祭司职责的繁重负担，以此强调女祭司作为神的代言人这一角色。

Akuku 及其它宗教随身用品，如草帽和珠子，也使用在女孩的成年礼 Dipo 上。这表明普通的宗教服饰包含有另外的内涵。Dipo 背景下的 akuku 发式象征着 Dangme 成年礼带有宗教的纯洁性。现在巴塞尔博物馆档案中的一张 19 世纪后期的照片，提供了 Dangme 的 Krobo 和 Shai 女孩们在成年礼中采用 akuku 发式的相关历史资料。居住在 Volta 河东边 Agotime Kpetoe 镇的 Dangme 人现在仍梳这种发式。据该族的民间传说，他们是 18 世纪从 Prampram 附近的海边小镇 Kpone 迁徙来的，所以至今仍保留着 akuku 发式以及 Dangme 服饰的一些其他特征。下面将列举这一带祭师在仪式中使用的主要道具。

帽子

帽子即是祭师们借以展示其宗教影响力的道具之一。最受尊敬的是 Komipee——一种由椰树纤维编织而成草帽，Dangme 人称之为 soni。这种草帽为高级祭司所专用，女祭司也不能戴它。草帽编好后要涂上白色泥巴，此外，因其重大的宗教意义，Komipee 都须经过特定的洗礼，然后保存在专门的房里以备女孩成年礼上使用。祭司们在加冕前要经过 Dipo，以纯净自己的精神境界。Komi pee 用具宗教魔法的物质——椰纤维制成，象征与远祖的联系。Prampram 地区 Digble 海神的祭司头领，就有一顶装饰有红鹦鹉羽毛的 Komipee。他宣称，鉴于这个帽子与生俱来的神力，他一年仅在 kpledzo 节目中戴一次，在那种场合，他通常享有最高贵的位置——全是木雕装饰的凳子。仪式过后 komi pee 又放回神庙的保管室直到下一年的 kplepzo 节。帽子与凳子的同时出现，表明了在 Prampram 镇和 Dangme 地区的其它地方，它们二者通常的象征功能。Old Ningo 镇的 Nene Hargo Taffa 解释说用草帽加冕是神赐予的大幅。Huber 也声称，在 Dangme 的 Krobo 人相信戴了这个草帽就是坐在神的中间了。综上所述，为了实现某种宗教上的目的，草帽，借助特定的宗教艺术形式，而转化成了促进与神灵沟通的道具。

金属装饰物

虽然黄金装饰物用在中层首领们的服装上并非为体现某种与生俱来的神秘力量，Dangme 祭司们从根本上排斥所谓“红金属”——金或铜的合金制成的所有饰品，认为它们破坏了神的力量。黄金也被看做属于物质的东西和为了展示的东西，他们认为黄金饰品光耀了佩戴者而不是神。所以包括 Old Ningo 的酋长，由于他所处的位置等同于 Jange 神的祭司首领，也不能够使用金铜饰品，如果他违反了这个规定就会感染上麻风病。另外，银子象征温和、柔软，它受到祭师们喜爱的程度超过金子。男女祭司佩戴最为耀眼的金属饰品，包括象征“魔力”的铁铸铃铛和长银链。同样，高等级的女祭司们也用有象征意义的银发夹来装饰她们的 akuku 发式。戴银饰品表现了一种自我奉献、自我否认以及对于神的意志的完全屈服，在这里，宗教上的需要转化了人们

的审美情趣。

衣服

宗教服饰在样式方面的一系列限定。Taka 或 bojuwe 被认为是古代服饰。Taka 是一种简单的扎在腰上和腿间的缠腰布，据欧洲旅行家 Paul Isert 所称，18 世纪后期 Ga 和 Dangme 人曾使用过它。因为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现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服饰。过去，仅在诸如节日和为氏族中的老人、酋长、祭司举行的葬礼这样的宗教仪式中，才穿着这种服饰。

总体而言，过去的两百年中，Dangme 宗教服装的主要成份基本上延续了下来，但也部分地受到外界的影响。在 Prampram，宗教仪式服装则一直在变更，某些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

更早时我提到过性别的重要性，这关系到 Dangme 人是怎样对他们的神进行分类的：没有哪个地方象 Prampram 一样，与男神和女神相关的宗教服饰之间有如此根本的区别。今天的 Prampram 女神祭司用昂贵的欧洲面料把自己胸部以下全部包裹起来，然后在胸部和腹部系上一块红布。为男神服务的祭司则身着长袍，并在其服装的连接处加了块红布，系在肘和脖子上的黄色丝带，过去原是庆典集会上象征男神的标志，现在已不再出现。此外，男神祭师还要戴一种名为 panama 的欧式草帽。

In Prampram 宗教服装中，这些外来的很值得注意。Prampram 人自己承认它们不是原始的服装款式中的部份。要找到这个款式精确的原型是困难的。当我 1988 年 8 月访问 Accra 的 Ga 人祭司头领时，清楚地看见了他在宗教场合穿的这套源自欧洲的服装——腰间斜穿着白色的丝绸女式长袍，戴着一顶大草帽。他说这是一件复制品，是早期的欧洲参观者赠予他祖先的，一直保存在祭司室里。1850 年，瑞士布道会的传教士们在 Prampram 地区传教，Prampram 人使用 panama 草帽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因为宗教服装的这种变化仅仅存在 Prampram 地区，与 Dangme 的情况相比，这种对欧洲影响的反应更为独特。

然而，后面的调查没有揭示出是否在现代 Prampram 社会可能存在奴隶的问题。Prampram 的老人们不承认事情象附近社区所报导的那样，即 Prampram 曾输入过 19 世纪从哥伦比亚和西非的部分地方归还的奴隶，没人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因它相当犯忌。许多人转而谈论一些后来搬迁过来的家庭，介绍他们自己的神。或许这段历史是存在过，人们只需要看一看 Bahian Candomble Nago 所穿的宗教衣服，便看出他们与大洋彼岸的联系。

19 世纪巴塞尔布道团从 Prampram 带回的两张照片，从中可看出，在 1880 年左右，宗教服装方面这些外来的成分，已得到镇上的人的充分认可。第一张照片拍的是 Marte Akoto Klegneti，海神 Digble 的祭司头领，旁边是他常坐的凳子，还有大地神 Lalue 的女祭司。另一张相片上仍是她，旁边坐着一老者。因为现代 Digble 神的祭司头领只在每年的 kpledzo 节庆才穿这种衣服，可以假定两张相片可能是偶然拍成的。最近照片带回了 Prampram，图片上相似的传统宗教服装，证明了 Dangme 服饰艺术的长久存留。

Dangme 宗教的自我装饰明白显示了与所崇拜的神有关。总体上看，宗教服装传递了关于等级、性别和宗教联盟等方面的信息。这些元素构成了男女祭司间社会等级的基础。宗教服装也反映了宇宙与社会之间的联系。Dangme 人把感觉到的精神世界当作是真实世界的复制品，而自我装饰和宗教仪式再次证明反映了存在于 Dangme 人两个世界中的强制与和谐。

总之，Dangme 宗教艺术不是过去的再现，是因为它们几乎全都保存时间短暂，它所产生的永久性的社会象征物，如凳子这类东西和纹身一样，留存也很短。他们在自我装饰上的不断实践不仅增强了对效果的信心，也给了宗教艺术无限的创造空间。在 Dangme 人的人生观中，坚持自我装饰的传统思想比艺术的发明创造更重要。N.A.M.kole 和 Manga Krobo 的 Konor 曾经都谈到：“一个人不能抛弃他所不能领悟的原始东西。” Dangme 人坚持使用这些艺术形式的一贯性显示出在正在发生着的社会变革中，这种将个人的信念与宗教自我装饰的结合将会继续下去。

Tellem 和 Dogon 物质文化的比较研究

R.M.A. 本道克斯

降水略显丰沛，水份蒸发缓慢，土地比周围地区更肥沃。居住在这种悬崖洞穴中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外人很难进得来，这使得 Dogon 人直至今日仍保持着完全独立的生活方式。然而，尤其是在过去的 15 年中，深刻的变迁已经发生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会势力在这一带进一步渗入，到这里来观光旅游的游客也与日俱增。过去的六十年中，人口已增长了将近四倍，与此同时，地区的降雨量却戏剧般地减少了。

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

对于本杂志的读者，已没必要对 Dogon 文化作更多的概述，然而，专门针对研究的某些方面作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仍是必要的。关于 Dogon 文化与 Tellem 文化——早先居住于这一地区的另一族群——之间的关系，就是值得专门讨论的主题之一。本文将以考古发掘、人种学方面的调查，以及对主要流传在 Sanga 地区的 Dogon 族口头传说的研究为基础，展开对 Dogon 与 Tellem 物质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不仅仅只停留在对该地区的历史作一番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更有助于我们揭示两者之间的联系。

我将在 Sanga 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化遗迹以及创造这些文明的族群命名为“Toloy”——首次发现这类遗迹的洞穴所在的峡谷名。这些古老的文化遗迹包括 40 多个用泥土盘绕堆砌成的谷仓。谷仓墙体内外光滑，外表面上却有清晰可见的纵向的手指划痕。谷仓的顶盖中央饰有用手指在一层薄土上画出来的图案。一些手工制作的印纹陶碎片混在墙体内，墙内还发现有残余的草药。此外，没有人工培植谷物的痕迹，这些谷仓已被证明是建于公元前 3 世纪——公元前 2 世纪，与附近的位于 Bani 河流域的 Jenne-jeno 文化遗迹属同一时代。

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1 世纪，Tellem 文化留下了最古老的遗迹，而这段时间，在 Sanga 地区却没有留下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由于 Toloy 文化与 Tellem 文化在年代上相隔了 11 个世纪之久，而且物质文化上的差异也很大，很难说两者之间有关系。然而，因为一直没有发现属于 Toloy 文化的人类遗骸，关于二者联系的假设就既没有被证实也无法证伪。

大约在 11 世纪到 16 世纪期间，Tellem 人陆续迁到这个地区。他们往 Bangiagara 悬崖的迁徙可能与由 Ghare 族的衰落而引起的往东、南方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相关。Tellem 人所用过的洞穴的数量，以及洞穴中遗存的大量的 Tellem 人骨骸表明，该族群的人口密度最初是很高的，但在 13 世纪后开始降低。

Tellem 人使用这些洞穴有三种用途：作为安葬死者的墓穴，作为举行葬礼的场所，作为储藏食物的仓库。死者下葬时全身着装，包裹着毯子，通常有一定的随葬品。进入墓穴的入口用一种晒干的泥砖筑墙密封起来。有些情况下，旧谷仓也可作上述用途。葬礼的一部分是在墓穴下方一个专门的洞穴中进行的，这类洞穴的地上通常零乱地放置着一种特殊的陶器，显然不同于日常用的那种。一部分墓穴中竟安葬有将近 3000 具遗体。就发现于各个洞穴中的遗骸头盖骨尺寸来看，他们均属同一种群。

Tellem 人已开始农耕生产（粟、大米），同时也采集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此外，驯养动物（骆驼、山羊、绵羊等）、狩猎（水牛、羚羊、瞪羚等）也是他们食物来源的一部分。然而，很难说清到底哪种生产方式，哪项食物来源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但也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原因。这一带的农业生产一直很不稳定，一旦雨季没能按时到来，或没有足够的降水量，就很容易导致饥荒。直到最近，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饥荒使得各种疾病更容易到处蔓延，阿拉伯人的史书中就有关于这段时期的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的记载。从 13 世纪起，Tellem 族的人口就一直在衰减，综上所述，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亡是必然的。这里也并不否认有一部分 Tellem 人可能已被融入其他民族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Tellem 人的数量应该很少，不足以与其融入的民族之间形成民族学上可测量的文化形态差异。

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在 Tellem 族和 Dogon 族的物质文化之间的进行的比较研究。首先，Dogon 族的起源不明确。在该族的创世神话中，关于其文明发源地就有至少三种说法。北方（Diyigou，湖泊以北？），西南方（Manda，Bamako，西南部？），南方（Yatenga，位于 Burkina Faso）。至今没有考古资料可以支持任何一种说法。不同地区的 Dogon 族群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差异（例如，某些地方的 Dogon 人没有面具，此外，语言、建筑技术、制陶技术等方差也很大）。从这些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Dogon 文化渗入的不同程度。地理上的分隔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地域文化差异，在几个所谓的文明发祥地都没有发现任何与现代 Dogon 文化相似的特征。（比如在 Niani，据估计是古代 Mali 人的首都之一；Jenne-Jeno，Toguere Galia 和 Toguere Doupwil，湖泊地区，Yatenga 地区等）第二，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 Dogon 族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我们实际掌握的唯一资料，来源于在 Hombovi——17 世纪保存至今的 Dogon 早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仅此当然不足以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今天 Dogon 文化内部的地域间差异比当时更为显著了，但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必须先将当代 Dogon 人和当代 Tellem 人的物质、文化作一番比较。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我和几个荷兰籍研究人员，从 1983 年到 1986 年，在 Sanga 地区的所作的考古学调查的发现。尽管这些调查在方案设计上有些教条，但将当代 Dogon 文化作为一个复合体，我们仍从中收集到不少物质文化方面的信息资料。

第三，我们关于 Tellem 人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全来自对其墓穴的考古发现，而关于 Dogon 人的这些资料则主要依靠对其住宅的调查，基于这样的材料进行研究，多半是不完善的。当然，大多数随葬品的情况表明它们并不是专门为这一目的制作的。一些枕头显然使用过，一些碗和锄头也如此。皮手镯通常都有戴过的痕迹，有一件样品甚至是修理过的。

在这期间 Tellem 人居住的遗址上，至今都仍未发现这种陶器。Tellem 人的村寨可能就座落在 Bandiagara 悬崖脚下，这可以说明他们的文化遗迹不是被埋在 Dogon 人的废墟之下，就是已被后来的 Dogon 毁掉了。还保留有 Tellem 人遗迹的洞穴则是因为长期无人居住，才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

14 世纪以后，Tellem 文化在建筑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早期的建筑用的是手工制造的泥坯，先经过太阳晒，使其变硬，然后结合灰泥砌筑成的。从 15 世纪起，Tellem 人的建筑全采用石构造。

根据 Dogon 人的口头传说，早在 15 世纪，他们就已在 Sanga 地区建立了最早的居住地。Griaule 在 Dogon 村落 Ibi 的一个洞穴里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传说中提到的这个年代。Griaule 在那里发现了九个在 Sigui 仪式上使用的面具，这种面具每隔 60 年制作一个，由此可推断，其中最古老的那个面具制于 15 世纪初期。附近一带流传的一些与 Dogon 人在此建立居住地有关的传说，也证实了这一年代的可靠性。

在距今最近的 Tellem 墓穴中，考古学家们找到了一些极罕见的陪葬的动物遗骸（海龟、鹤），而一般常见的随葬品在这里却几乎没有。在 Dogon 族的创世神话中，是“鹤”将他们的祖先从遥远的故乡 Mande 带到这片悬崖地带的，海龟也是这类神话中的重要角色。洞穴中发现的鹤和海龟遗骸经鉴定正是 15—16 世纪留下来的，这个时间正好与 Dogon 人声称的迁徙至此的时间吻合。然而，就在同一个洞穴中发现的人类遗骨，就体格尺寸来看明显是 Tellem 人的一个亚种。而更晚期的洞穴（17 世纪—18 世纪）中所发现的遗骸却又不能归于 Tellem 种。因此，在这个距今最近的 Tellem 墓穴中的考古发现可以解释为 Dogon 文化在建筑技术及丧葬习俗方面，对同时代的 Tellem 文化产生了影响。

据 Dogon 族的传说：当 Tellem 人离开 Bandiagara 悬崖时，Dogon 人随之迁徙到 Hombori，进而到 Yatenga，据说就是现在的 Kuvumba 人。为了证明这种说法，考古学家们调查了 Hombori 一带许多洞穴遗址。发现这一带遗留下来的建筑及其它方面的物质文化都迥异于 Tellem 文化，同时，在洞穴中发现的人类遗骸也被证明不属于 Tellem 族。对现代 Kurumba 人的人种学研究表明，他们也不是 Tellem 族人的后代。

既然 Tellem 人不是 Dogon 人的祖先，也不是周围任何一个民族的祖先，那么，关于这一族群如何在 15—16 世纪后逐渐消失，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从阿拉伯人的史书中，我们得知正是在 15、16 两个世纪中，Songhai 人和 Mossi 人曾侵略过这片地区。从 Tellem 人那段时间居住洞穴的数量以及遗骸的数量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口的急剧减少，外族的入侵也许是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但也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原因。这一带的农业生产一直很不稳定，一旦雨季没能按时到来，或没有足够的降水量，就很容易导致饥荒。直到最近，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饥荒使得各种疾病更容易到处蔓延，阿拉伯人的史书中就有关于这段时期的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的记载。从 13 世纪起，Tellem 族的人口就一直在衰减，综上所述，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亡是必然的。这里也并不否认有一部分 Tellem 人可能已被融入其他民族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Tellem 人的数量应该很少，不足以与其融入的民族之间形成民族学上可测量的文化形态差异。

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在 Tellem 族和 Dogon 族的物质文化之间的进行的比较研究。首先，Dogon 族的起源不明确。在该族的创世神话中，关于其文明发源地就有至少三种说法。北方（Diyigou，湖泊以北？），西南方（Manda，Bamako，西南部？），南方（Yatenga，位于 Burkina Faso）。至今没有考古资料可以支持任何一种说法。不同地区的 Dogon 族群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差异（例如，某些地方的 Dogon 人没有面具，此外，语言、建筑技术、制陶技术等方差也很大）。从这些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Dogon 文化渗入的不同程度。地理上的分隔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地域文化差异，在几个所谓的文明发祥地都没有发现任何与现代 Dogon 文化相似的特征。（比如在 Niani，据估计是古代 Mali 人的首都之一；Jenne-Jeno，Toguere Galia 和 Toguere Doupwil，湖泊地区，Yatenga 地区等）第二，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 Dogon 族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我们实际掌握的唯一资料，来源于在 Hombovi——17 世纪保存至今的 Dogon 早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仅此当然不足以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今天 Dogon 文化内部的地域间差异比当时更为显著了，但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必须先将当代 Dogon 人和当代 Tellem 人的物质、文化作一番比较。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我和几个荷兰籍研究人员，从 1983 年到 1986 年，在 Sanga 地区的所作的考古学调查的发现。尽管这些调查在方案设计上有些教条，但将当代 Dogon 文化作为一个复合体，我们仍从中收集到不少物质文化方面的信息资料。

第三，我们关于 Tellem 人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全来自对其墓穴的考古发现，而关于 Dogon 人的这些资料则主要依靠对其住宅的调查，基于这样的材料进行研究，多半是不完善的。当然，大多数随葬品的情况表明它们并不是专门为这一目的制作的。一些枕头显然使用过，一些碗和锄头也如此。皮手镯通常都有戴过的痕迹，有一件样品甚至是修理过的。